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右派骨干分子言論选辑)

第六輯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部发行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右派骨干分子言论选辑)

第六輯

合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状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新华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成都印制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42頁·2厚印張·64,000字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83 定價：（5）一角9分

統一書號：3118·26

目 錄

- 加强党与非党知識分子的团结（羅隆基） (2)
-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費孝通） (8)
- “早春”前后（費孝通） (19)
-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
（曾昭掄、錢偉長等） (24)
- 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負責制（叶篤義） (30)
- 談人民生活（羅翼群） (31)
-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地生） ... (32)
- 工人农民对党都不滿（馬哲民） (33)
- “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葛佩琦） (37)
- “党已經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王德周） (38)
- * * *
- 龙云的反苏言論 (39)
- * * *
- 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風精神（陳銘樞） (40)
- 对經過几陣“暴風雨”的看法（陳新桂） (41)
- 三个問題（徐中玉） (43)

-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蕭乾) (50)
- 社会主义建設的新課題(張百生、黃振旅) (57)
- 烏“畫”啼(徐仲年) (67)
- 馬列主義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
(葉子正) (69)
- 我認為階級分析方法已經過時了(張祖榮) (71)
- 馬克思主義“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
(雷海宗) (73)
- 上海在沉思中(劉賓雁) (75)
- 电影的鑼鼓(鍾惦棐) (77)

前　　言

党领导下的整風运动，現在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为了繼續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和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社已經編选出版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資料第一、二、三、四輯（內容包括：党中央負責同志有关的重要報告和發言，人民日报有关的社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一些重要發言和其他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文章等），以供各机关干部和知識分子學習参考。

为了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徹底批判各种右派反动言論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觀點，加深机关干部和知識分子对右派反动本質的認識，并供各級学校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时的参考，特将一些資產階級右派骨干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編选成冊，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資料的附录出版，交新华書店内部發行。

毒草是可以肥田的。我們希望讀者在閱讀这些反动謬論时，必須注意端正無产階級立場，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加以批判，以提高我們的政治嗅覺和革命战斗力。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1957年10月

加强党与非党知識分子的团结

罗隆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去年冬天我到四川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接触到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問題，最近我负责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知識分子問題小組的座谈会，又听到了許多有关知識分子問題的反映，現在我根据这些材料来談談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

一年來的成績和缺点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从周恩来总理旧年1月先后發表了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努力，在貫徹对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上，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成績。知識分子的工資普遍地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解决了。高级知識分子的工作条件，如时间、助手、圖書資料、仪器设备等問題，到今天尽管不能处处尽滿人意，但在可能范围内，都得到了改善。高级知識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广泛的和适当的調整。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高级知識分子都感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级知識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般高级知識分子不再象一年前的消沉，現在兴奋起来了；不再象一年前的消極，現在積極起來了。今天旧的高级知識分子，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們應該肯定，并且必須肯定。

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地在發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旧問題是不断地在解决，新問題是不断地在产生。各位委员从视察中和座谈会中当然都知道，当前知識分子的問題仍然还是不少。在这里，我認為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有人說：“代表委员們

年年觀察，次次反映，反映尽管反映，問題还是問題”，我認為这种說法是不妥當的，是與事實不符合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會就印發了一些有關單位答復解決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的材料，這就充分地證明上面這種悲觀論調是錯誤的。第二，國家正在一個發展很快的過渡時期中，對任何方面的問題，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是不會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我們的責任只能是：幫助黨和政府，天天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並且解決問題。

當前，在知識分子方面，還存在些什麼問題呢？在安排和使用方面，還有某些需要進一步調整的情況。學哲學的人在圖書館編書目，學法律的人在機關里做會計，學染料化學的人在中學教語文，學機械工程的人在中學教歷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學政法、財經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學校挂名領薪，而沒有開課的人還是不少，甚至散居在社會上的高級知識分子中，還有英國留學生拉板車，美國留學生擺煙攤的情形。這當然只是個別地區和個別單位的事例。這次知識分子問題小組座談會建議黨和政府通令全國，普遍檢查貫徹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的情況，我個人是同意這種建議的。這種情況是應該加以糾正的。國家現有的高級知識分子都能各盡所長，各得其所，這是知識分子的利益，這也正是國家的利益。

往年周恩來總理提出對知識分子問題政策的時候，重點放在高級知識分子方面，對一般普通知識分子問題，準備逐步地來解決。現在中、下層知識分子又起來呼呼了，認為高級知識分子得到了黨和政府的照顧，而對小知識分子，特別對小學教師的照顧不夠。其實往年工資調整，對小學教師的工資提高了很多，他們普遍表示興奮。但是小學教師教書的工作量已經很重，而有些地區的干部還要驅使他們充當雜役，替機關抄寫，替書店推銷，替農村打井筑堤，替糧庫晒谷守倉。小學教師疲於奔命，不聽命令，就要受到不應有的打擊。我們聽到這樣的呼呼：“救救6,300

万小学兒童的老师吧！”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視和輕視小学教师，的确是一种偏差。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是應該加以糾正的。

领导干部要主动努力改进工作

今天的关键問題，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識分子，精誠團結，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力量，为祖国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部分知識分子与党员之間有隔膜，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来了。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变化，經過肅反运动，高級知識分子的队伍更純潔了。各級党和政府努力貫徹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加强了高級知識分子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今天一般高級知識分子是願意在党的領導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們不只願意接受党的領導，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領導。諸位委員，今天的問題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領導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徹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融洽合作的目的。

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須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認為这种見解是絕對正确的。在党员干部的“主动努力”方面，我願意提供几点参考意見。举些反映中的具体的事例來說，改善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采用評級制，少數教授埋怨評級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級高，党外人等級低。扩大知識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这种反映当然是少数的，并且是片面的。尽管如此，这就值得领导干部主动努力，进行檢查，看在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是在無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事实果真不是如此，事实就会給埋怨者以具体有效的說服教育。旧年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發言中我曾說过：

“毛澤東主席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間隔膜，加强團結的对症良方”，当时我以为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我們的思想意識，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先求團結，其“存异”的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各就所見，暢所欲言，这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辯愈明，真理愈爭愈显，百川异流，将来总是同归于海。然而事实怎样？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爭鳴”，鳴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据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級知識分子顧慮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鳴。这种現象的發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認識和体会。他們認為两个号召提出以后，今天社会已經是淫辞放恣，异端猖獗，他們就热心于尊統衛道的工作，以今之韓愈自任，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議論，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鳴”者，不惜口誅笔伐，“包抄”“圍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說，傳道統。这就使一般旧知識分子更加思想混乱，無所适从，更加退縮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顧后，栗栗危惧，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这种現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發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現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認真檢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糾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加深了解，消除彼此間的隔膜

隔膜是从双方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須双方面共同努力，倘此方認彼方为思想落后，而彼方認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見了自己的长处，却忽視了对方的长处；只看見了对方的短处，却忽視了自己的短处，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帮助，那末“落后”与“外行”之間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徹底認識和了解的問題。在我个人看来，我們旧知識分子在學習馬列主义理論外，还要好好地學習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們才能明白革命老干部經過了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鍛煉。革命老干部語言比較坦率，行为比較憨直，批評比較严厉，斗争比較猛烈。这是长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習慣。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識分子必須了解認識的。领导干部从軍事革命工作轉到文教领导工作的崗位上来，固然應該研究新的業務，以便加强具体領導，但在團結、教育和改造旧知識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馬列主义以外，也还應該讀讀“資治通鑑”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傳統，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性。名利觀念，个人打算，及其所謂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这一大套構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識分子不幸而有的弱点。它們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遺產，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們变本加厉了。徹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知識分子的知識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謂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政治亦有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責”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問政治的人，就看領導者怎样能够使他們發揮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傳統觀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則“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則“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謂“礼賢下士”“三顧茅廬”等等。

中国旧社会中的“士”，願做脫穎而出的毛遂者少，願做隴中待訪的諸葛亮者多。若得三顧茅廬，必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說在今天的新社會里，還必須用“禮賢下士”“三顧茅廬”的舊方式來團結高級知識分子，這絕對不是的。我必須指出，今天批評、鬥爭和改造的團結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禮”之“下”之是有矛盾的。怎樣來統一這個矛盾，怎樣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鼓起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消除彼此間的隔膜，這就靠領導幹部的“主動努力”了。

在目前來說，黨員領導幹部同舊知識分子相處共事的時候，在某些事情上，應該把個人和黨的界限分別清楚。領導幹部執行政策是可能發生偏差的，個人是可能犯錯誤的。一方面，不可以把個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個人的錯誤看成黨的錯誤。另一方面，接受黨的領導，不完全同於接受黨員個人的領導，黨員個人的威望不等於黨的威望。批評個別黨員，不管批評是否妥當，不等於反黨，更不等於反革命。我們今后必須深切地體會毛主席關於“怎樣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切指示來處理問題。這樣，黨與非黨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趨於融洽了。

民主黨派今後的任務

最後，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我願就個人的見解談一點我們民主黨派今後的任務。就拿我們中國民主同盟來說，幾年來我們民盟全體盟員在自我教育和改造以及團結教育中上層知識分子方面，是做了些工作的。我們的工作有成績，也有缺點。自从領導黨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以後，我們各民主黨派的責任加重了。怎樣進一步來做好我們的工作，完成我們的使命，這是我們當前一個嚴重的課題。在這次視察中，我們聽到這樣的反映：民主黨派中有些人的工作是“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

觀風色，看氣候，扣帽子，打冷拳。這些反映是值得我們深切反省的。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下，我們今后應真正成為領導黨的助手，我們應該真誠地接受黨的領導，坦率地對黨提出批評。我們要認真地貫徹“互相監督”，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今天一般舊的高級知識分子，思想上都有了進步和提高。極大部分的老年高級知識分子是業有專精，學有專長的。我們應該殷勤地接近他們，了解他們，虛心向他們學習，並且竭誠幫助他們。我們要代表他們的利益，反映他們的問題。協助他們克服困難，鼓勵他們貢獻意見，團結他們互相學習，共同改造。這是我們民主黨派每個成員的任務，我願同我們各民主黨派的同志們共同勉勵！

(原載1957年3月23日人民日報)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

費孝通

我想談談知識分子，談談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學校里教書的老朋友們的心情。所談的無非是一隅之見，一時之感；寫出來還是雜文之類的東西而已。

出門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個通知，是勞動幹部學校邀我去參加一個座談會，討論陳達先生的一篇有關人口問題論文的提綱。陳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師。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一個几十年如一日的學者，社會學的老前輩，桃李滿門牆的灰髮教授。解放以來，一直還是手不釋卷，但是報紙雜誌上却很少見他的名字，書店裡也已經找不到他所寫的書，同行老朋友見面時常會互相打听陳先生近來怎樣了。這個通知是一個喜訊。他老人家

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又活躍起来了。

还有，到家剛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連載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輩，30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書的作者。我記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个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座談会上，李先生曾說起过他自从院系調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門不同的而都沒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課。尽管他用了極为幽默的口吻，很輕松地道來，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話头。那时誰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貴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訊，同时也报了知識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訊。

春到人間，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这个感觉并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會會見过不久前为了箋注杜詩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訪回來的刘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張文淵先生邀我去吃小館子送行，大談他正在設計中的排字机器。这半年多来，知識分子的变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視？

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几年来，經過了狂風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識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象春雷般起了惊蟄作用，接着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們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覬覦，自信力不那么强，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難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問題还是不少的。当然，問題总是有的，但当前的問題畢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去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們談吐之間，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

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喟。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的这种感喟是不多了。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設。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資治通鑑。

知識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蘊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問題。

这些知識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概括地答复这个問題是有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們这个范围里来摸摸摸摸。新年里報紙上曾發表过一些知識分子的新年願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說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呢？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談会上康振黃教授总结了在座許多朋友們的心願：“一間房、二本書”，意思是能靜靜地做做功課。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說个由來。一年多前知識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問題基本解决了，現在感覺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較起来，生活条

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資提高了，過去許多只够衣食的教師們現在可以买买書了，就是子女多，家屬中有病人的困難戶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顧。生活上的問題总的說來基本上是解決了。知識分子是滿意的，甚至有點受之有愧。而且過去這一段時間里，很多學校里對高級知識分子照顧得也非常周到。比如為了剪髮、醫療、買菜等排队費時間，給高級知識分子優先待遇，甚至看戲都可以預定前排坐位。高級知識分子對於這些優待自然是領情的，但是這也使他們過分突出，叫別人看來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眾的反感。這些辦法是否妥當還值得考慮。我自己就沒有用過這些優待券，因為拿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應當說生活條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現在這已不是重點了。針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來說，現在主要是要幫助他們提高業務。先談談他們的業務情況罷。在教學改革初期，教師們曾經緊張過一陣。那是由於要學習蘇聯，很多教材都要新編，又由於經過思想改造運動，許多教師們把原來學來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體系沒有建立，有些青黃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譯講義，顯得很忙。這兩年來，是不是學習蘇聯已經學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學術體系已經建立了呢？我想並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課的困難似乎確是比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師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講義也編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讀，問題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發生了新的情況，反教條主義的結果，對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養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老師自己先得要獨立思考一番。過去和教本不同的說法，不論自己信與不信，可以閉口不談，現在得講講各家的異同，那就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沒有鑽研過，道理也就說不明白。過去可以口头上復述一些心裡不太同意的理論，現在心口不一致，連自圓其說都有難處了。過去可以根據權威對那些自己連原書都沒有見過的異說，跟着大加駁斥，現在別人一追問就會露馬腳了。總之，現在沒有一點真才實學。

教書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质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师們業務上的緊張的道理也在此。

我所接触到的許多朋友們，对反教条主义是拥护的，对自己提高業務的要求也是积极的，他們要求帮助也是真实的。要“一間房、二本書”靜靜地做做功課就是指这个。說得具体一些，他們要求开展科学的研究，要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會議，甚至要脱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等。这种要求是好的，应当說是可貴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实际情况，帮助教师們提高業務的科学的研究开展得怎样了呢？有的学校好些，有的学校差些，总的說来，我認為并沒有滿足教师們的要求。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的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令人滿意的情况，关键問題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好呢？我看并不如此。教师們工作条件在过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說过去吵得最凶的时间問題。自从規定六分之五的業務时间之后，各地高等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貫徹，效果是不坏的。去年上半年，北京的高等学校里大約已有四分之三的教师得到了保証。8月里我到昆明，听说云南大学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教师还不能保証業務时间。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学校業務时间得不到保証的教师比例已降到十分之一以下。这个問題虽則不能說全部解决，而且象李达先生在新年願望中所提到的情况还是存在，这些業務时间得不到保証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学的研究的，但是一般說来時間問題已不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了。其次，圖書、資料、仪器、設備的条件怎样呢？这些条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过去一年中，各校购置圖書一般都有增加，現在的問題主要不是書少，而是編目慢、流通难，分配还不够合理。仪器方面在生产、供应、修配、使用上問題还多，特別是内地和边区的学校困难不少。但过去一年中，我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別的专题

外，一般还没有发生有人因为这些方面的条件缺乏而不能进行科学的研究的。

那么现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在开展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具体领导不够。在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强了对教师们科学的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些学校里的教师们也就安心工作，业务有提高，学生也满意；凡是放松了这方面领导的，教师们彷徨苦闷，情绪也多。这种区别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当前积极要求提高业务，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

全国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的研究工作开展得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没有把科学的研究工作认真领导起来的学校还是不少的。有些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做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们填题目，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手要成果。在高等学校里究竟应当搞些什么研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怎样结合？各科抓些什么问题？教师之间又怎样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进行研究时要什么具体条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怎样帮助克服？怎样组织讨论来提高学术思想？——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教师能单独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上都须要具体领导。如果学校领导上不深入实际，依靠科学的研究上有经验的教师，逐步地跟着工作的开展，解决这些问题，教师们尽管主观上怎样积极，科学的研究工作不是开展不起来，就是搞得有些混乱。我就遇到过已经填过几次科学的研究计划表的朋友，见了我还是说科学的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连自己在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象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另外还有些朋友，急于赶世界水平，对实际条件考虑不够，一动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学任务碰了头，时间冲突，精力兼顾不来，发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学校领导上对第一种情况倒并不焦急，按兵不动，但求完得成当前的教学